

重寫翻譯史

● 孔慧怡

關於歷史

我們談論重寫歷史之前，大概應該先回答一個「後現代」問題：在這個提倡只有文本而沒有史實的年代，不少人認為歷史只是由寫史的人虛構出來的敘述，我們為甚麼還要寫翻譯史呢？

歷史哲學方面的探討並不是我的專長，但過去十多年國際上不少史學家針對後現代主義帶來的衝擊，作出相當深入的思考，正好有助於我解答「為何寫史」這個問題。艾文斯 (Richard J. Evans) 並不否認後現代觀點對於如何理解寫史和讀史有一定的啟發，但他也同時展示後現代主義者很多關於歷史的說法相當偏頗，常有誇大其詞或以詞奪理之嫌^①。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採取極端的相對主義，那麼不但寫歷史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類知識也都會失去穩定的立足點。再說，相對主義也並不是「後學」創造出來的，事實上自從二十世紀中葉，史學界就相對主義已有持久的辯論，其中兩人所用的譬喻更是很多人耳熟能詳的了。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 以下一段話，曾經令他被視為歷史事實的懷疑主義者^②：

聖奧吉斯坦用早期天主教徒的眼光看歷史；泰拉蒙特用十七世紀法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吉本用十八世紀英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如果要問那一個觀點才算正確，那是毫無意義的。上述每個人都只可能用他本人的眼光看歷史。

比他晚一代的卡爾 (E. H. Carr) 針對懷疑主義，作出以下回應^③：

一座山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形狀，但我們不能因此說這座山完全沒有形狀，又或者是無無限量的形狀。

長久以來，逆主流觀點來看事物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法門，公元五世紀的希羅多德 (Herodotus) 可說是「批判性歷史」(critical history) 的始祖。我深信引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翻譯史料，不但可行，而且應該有相當價值。

啟發這篇論文的材料，是中國二千多年翻譯活動的文字記載。以近年種種「後」潮流來看，覆蓋如此廣的

過去十多年不少史學家針對後現代主義帶來的衝擊，作出相當深入的思考。長久以來，逆主流觀點來看事物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法門，公元五世紀的希羅多德可說是「批判性歷史」的始祖。採取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翻譯史料，應該有相當價值。

論文不免要惹來獨斷式敘事 (master narrative) 的嫌疑。先不說我對潮流沒有興趣，即使真的順着潮流角度看，這份擔心也是多餘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對中國翻譯史的重新思考，本身就是對現有的主流權威敘事作出的反應，這個過程的產物稱之為「反敘事」更為合適。第二，本文提出種種概念，目標是以新的眼光重看中國有史以來的翻譯活動，找尋前人沒有看出的意義，顯示前人未曾察覺的架構，藉以加強我們對於翻譯活動與中國文化發展相互關係的理解，而並非評價翻譯活動的優或劣、宜或不宜。這篇文章最基本的目的是向人文學科——特別是翻譯研究——的學者指出，如果肯認真審視存世資料，我們會發現中國翻譯史學到目前為止仍是一塊未開發的園地，值得我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對整個題目重新思考。

關於重寫

上一節交代了我目前對歷史及中國翻譯史的基本看法，這一節應該把注意力轉到「重寫」了。說「重寫」而不說「寫」，自然是因為論述的背後有幾項基本假設：第一，目前已經有一種或多種專著談這個題目，而這些出版物在整個文化體系裏形成了主導性話語；第二，建議重寫的人認為現有的作品有不足之處，或是研究資料欠缺與錯漏，或是研究方向或方法有問題；第三，建議重寫的人心目中有一份綱領，此綱領可能是建基於新材料，或是以新方法分析現有材料，又或是兩者兼備，而結果都是要建立一種新史學；第四，建議重寫的人相信從這個新角度入手，不但可以在有關學科範圍之內提昇大家的理解，同時

也能突顯這門學科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怎麼樣的關係；也就是說從深度和廣度都能有所推進。

在這裏我們先談第一點和第二點，也就是現有的中國翻譯史和它們隱藏着的問題。

雖然翻譯研究在中國是新興學問，而撰寫翻譯史更是一個近期現象，但過去15年中，嘗試用史學角度來敘述中國翻譯活動的作品已超過十種^④。在這裏我們無法逐一分析其性質與寫作目標^⑤，只能簡潔地綜合這些作品的共同特性，分列如下。

(甲) 文學傾向過重

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有關翻譯的話語都帶有極強的文學偏向。造成這個現象，有幾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翻譯活動首先進入中國知識主流文化，是通過十九世紀末興起的小說翻譯運動，這個運動的頂峰期是二十世紀的頭十年^⑥。由於小說翻譯運動以民族自強革新為目標，紮根於一股力量龐大的愛國主義，所以文學翻譯也因此打進了意識形態的中心位置。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標榜文學的地位，此一傳統深入人心，對於文學性的文本(包括翻譯文學)在文化體系中保持優越地位，實在大有助力。自從中國共產黨興起，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文學被視為重要的宣傳工具，這也有助於加強或維持文學作品在意識形態舞台的中心位置。最後一個因素，是中國翻譯研究建基於1980年代初，此時在國際翻譯研究方面興起了一股新風氣，起主導作用的是一群有比較文學背景的研究者，而翻譯研究的話語亦自此出現一大轉變。這個國際風氣大概加強了中國學者的信心，認為聚焦於文學翻譯是很

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有關翻譯的話語都帶有極強的文學偏向。然而，在中國悠久的翻譯經驗中，文學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偏向使人誤以為用於文學翻譯的研究話語也可以引用於其他形式的翻譯活動，並妨礙了研究者尋找各類型翻譯活動的共通點。

正確的做法。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翻譯研究這個領域，文學翻譯的中心性是由多方面的支持建立起來的，包括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經驗，中國傳統文化對文學的一貫抬舉，政府意識形態和政策，與及在某一時期文學翻譯似乎在國際學術圈子佔了優勢。

問題是，文學偏向是否對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造成障礙或阻力呢？我的看法是：的確如此。文學偏向掩蓋了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悠久的翻譯經驗中，文學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偏向也給人一個錯覺，以為用於文學翻譯的研究話語同時也可以引用於其他形式的翻譯活動。最重要的問題是，從史學觀點來看，文學偏向妨礙了研究者尋找各類型翻譯活動的共通點，以至讓大家認為中國翻譯史上各時期、各類型的活動是互不相干的。

(乙) 極度依賴間接資料

現有的翻譯史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資料，同時也頗愛引用名人評語，很少再加考證或思考；這個缺陷在敘述或討論二十世紀以前的翻譯活動時，尤其明顯。要明白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其實並不困難。要對中國悠久的翻譯經驗作出初步了解，所需的專門知識光以量來說，就足以教人望而卻步。除了整個二十世紀的社會、文化與文學發展之外，研究者起碼要懂得中國佛教史中翻譯活動的基本層面，同時也要涉獵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文化活動，更不能缺少對中國各朝歷史的基本知識。當然，上述各種學科也有些學者會從他們本學科的角度探討某些翻譯活動，但是這類探討一來並不以翻譯為中心研究對象，二來也只會涉及特定時期或特定活動類

型，不可能對中國翻譯史作出整體的觀照。要全面了解中國的翻譯經驗，還需要依靠專門從事翻譯研究的人。問題是，中國大陸的翻譯學者大多出身於外語系，工作單位也多半是外語系，他們對古文的掌握和對古籍的知識，都不足以讓他們直接大量搜尋及鑽研原始材料，因此也就無可避免地要依賴其他學科——如歷史、文學、中國佛教、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所做出來的成果。

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翻譯研究為這份依賴實在付出了代價。出自其他學科的專論，自然以他們本學科為中心，翻譯活動只佔次要或邊緣地位；同時，任何有關翻譯的記載，也是通過這些學科的篩選角度才進入其敘述範圍，篩選的原則並不以翻譯為主要考慮。假如翻譯研究者對這類資料隱藏的問題不是時刻警覺，又對中國歷史背景缺乏透徹的理解，那麼他們筆下的歷史或敘述，輕則讓翻譯問題失去比例上的平衡，重則讓翻譯問題埋藏於其他學科的主題之下。假如對依賴二、三手資料可能造成的失誤缺乏基本了解，其研究成果也就只是柯靈烏所說的「以剪刀和漿糊拼湊成的歷史」^⑦而已。

(丙) 觀點與理解問題

現有的中國翻譯史幾乎全部建基於以下幾種分期或分類方法：一，以朝代為分界線（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二十世紀歷史分為1919年以前的「近代」，1949年以前的「現代」，及1949年以後的「當代」）；二，以個人成就為焦點，亦即以個別有名的譯者為敘事單位；三，以文本種類劃分，例如佛經、聖經、科學、文學等。根據不同的分類形式，這些翻譯史的敘述或按歷史時間順序編排，或按名家生平

中國大陸的翻譯學者大多出身外語系，他們的古文程度和對古籍的知識，都不足以讓他們直接大量搜尋及鑽研原始材料，因此無可避免要依賴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假如翻譯研究過份依賴二、三手資料，其研究成果可能只是「以剪刀和漿糊拼湊成的歷史」而已。

或文本性質編排，乍看都似乎順理成章。但歷史學家如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就曾經指出，歷史與年表或大事紀錄這類文本有一種最基本的分別，就是後者只是一連串事件的記錄，而前者則展示出表面看來獨立的事件有怎麼樣的內在關連^⑧。寫史並不只是收集歷史資料，更重要的是找尋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與模式，讓我們對整個題目和相關的事情達到更深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的中國翻譯史，不少似乎稱之為活動紀事錄或資料彙編更為恰當。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面對歷史資料時，能否持開放的態度，是否願意讓歷史資料向我們顯示背後的故事，又抑或是早有固定的框架，用來套在歷史資料上，強迫資料去說我們認為它應該說的故事。很不巧，現有的中國翻譯史著述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多緊跟着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來理解歷史活動^⑨。下面的引文錄自一篇有關新疆 (史稱西域) 語言及翻譯情況的論文，正好說明意識形態的局限如何妨礙研究者真正把關注集中於翻譯問題^⑩：

語言是信息的載體，而翻譯則是轉換各種語言載體的橋樑。在二十一世紀千禧之年，我們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政策的雨露滋潤下，在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懷抱中，一定會奔向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

這段引文讓我們感興趣的並不是寫作風格，而是它如何不自覺地顯示出在中國約束着翻譯研究的因素。文中用上一般只見於政治宣傳文字的高姿態讚詞，其實正顯示它的主題具有極度政治敏感性。我寫這篇論文的目的不是要在現有的翻譯研究作品中找岔子。我們都知道，不管是寫史的人

還是他們的作品，都無可避免地染上他們的社會、政治和學術背景的色彩；要是說到學問功夫，相信沒有認真的學者會認為自己是全才，做研究時總有盲點和障礙。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寫史和讀史的人都知道，偏見和障礙是肯定存在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其中一個好方法就是提出其他角度來觀照歷史^⑪。

三 新觀點

在這一節我會嘗試指出連貫各歷史翻譯活動的脈絡，而我捉摸到這些脈絡，是通過大規模 (但絕不是全面) 地閱讀歷史資料，包括中國各朝的正史、翻譯文本、有關中國佛教的學術研究、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與及二十世紀的各類翻譯活動。依循這些脈絡來重組中國的翻譯經驗，我們會看出文學翻譯並不是中國翻譯史的焦點。更重要的是，過往被視為沒有關連的各種翻譯活動，通過這些脈絡都可以聯繫起來。這固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翻譯作為文化活動的特性，同時也會讓我們更了解中國作為翻譯活動主體文化的特徵。

(甲) 中國的雙線翻譯傳統

提到「譯者」一詞，我們對於他們的基本能力和工作方式都會有些假設，可能是按他們所譯的文本種類分為幾類 (例如文學譯者、商務譯者)，又或者按他們的溝通方式與媒介來分類 (例如口譯與筆譯之別)，又或者按他們服務的環境和處境來分類 (例如社區傳譯、法庭傳譯、會議傳譯等)。就中國歷史翻譯活動而言，我在這裏建議可以分成兩大類，劃分的基礎是譯者本人如何看待他們與所處的社區和

寫史並不只是收集歷史資料，更重要的是找尋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與模式，讓我們對整個題目和相關的事情達到更深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少現有的中國翻譯史似乎應稱為活動紀事錄或資料彙編。而且現有的中國翻譯史著述大多緊跟着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來理解歷史活動。

我建議可把譯者分成事務性和文化性兩大類。前者滿足僱主的需求，他們的角色是促進現行制度順利運作，從而加強制度的穩定性。後者則嘗試通過翻譯來填補一個社群面對某一種文化轉移的需求，藉以推動他們本人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往往要挑戰現行制度和架構。

文化之間的關係：一類是事務性譯者，另一類是文化性譯者。

從最簡單的角度看，兩者分別如下：事務性譯者滿足他們的僱主在翻譯方面的需求，依循的是僱主定下的工作守則，和這類工作賴以運作的一般架構。他們的角色是促進現行制度順利運作，從而加強制度的穩定性。而文化性譯者則正好相反，他們察覺到一個社群面對某一種文化轉移的需要，因此嘗試通過翻譯來填補這需求，藉以推動他們本人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往往要挑戰現行制度和架構。

從這個分類法看翻譯活動，中國提供了特別有趣的例子，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事翻譯活動的人明顯是兩大類。二者分別不但在於文化定位，而且更延伸到其他領域，直接挑戰我們對譯者的語言能力和翻譯過程的傳統假設。事實上這兩者之間有那麼大的分歧，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一個雙線並行的翻譯傳統。以下列出這兩類譯者的特徵，藉以說明中國歷史翻譯活動的雙面性：

(1) 語言能力：事務性譯者都通雙語或多語；而參與傳統文化性翻譯運動的人，大多數卻只懂一種語言^②。

(2) 運作方式：事務性譯者通常單獨工作，而文化性譯者——包括懂雙語或多語的在內——則從事合作式或團隊式工作。後者的工作方式，以及只懂單語的人介入翻譯過程，讓文化性翻譯工作經常帶有口譯的部分。

(3) 目標聽／讀者：事務性譯者的服務對象是小眾或者個人，處理的是個別性的翻譯處境或事件。文化性譯者即使眼前有讀者或聽眾（如佛經譯場），他們的目光也必定超越眼前這一群人。

(4) 工作需求：事務性譯者要跟從已經建立好的一套翻譯方法、文本形式及翻譯方針；文化性譯者可以作

出自由的試驗和創新。事實上要向一個文化氣候不斷轉變的國家介紹外來文化因素，譯者除了試驗和創新外，亦別無選擇。

(5) 能見度：事務性譯者的工作與他們所服務的制度掛鉤，而不是與他們本人掛鉤，因此他們的存在是隱性的，也是無名的。文化性譯者如果要在眼前及未來大量聽／讀者群中造成影響，就必須加強其個人形象和權威性，所以不論他們本人、同道人和追隨者都會極力嘗試加強他們的公眾形象。

事務性與文化性兩類譯者在「能見度」和文化定位兩方面的差異，正是文化性譯者吸引翻譯研究者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實上，事務性翻譯的傳統同樣值得我們研究。撇開別的不說，光從教學角度來看，這也是必要的，因為大多數在大學裏唸翻譯或傳譯的畢業生，他們要走的道路正是事務性翻譯的路。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學生要尋找職業上的承傳，他們的目光應該往歷史性事務翻譯看。

在這裏我必須清楚說明一點，就是翻譯文本的性質與翻譯目標對譯作質素沒有任何直接影響。事實上，歷史上的文化翻譯活動一再向我們顯示，文化翻譯工作並沒有甚麼品質管制。另一方面，事務翻譯工作則一向定有起碼的標準，對質素有一定的保證。兩者的分別，在於基本屬性不同，組織方法迥異。一般中國翻譯研究者和業外人都相信，文化翻譯工作的品質通常較高，這其實只是第二節提到「文學性偏向」的一個自然後果，屬於未經查證的假設，而不是事實。

(乙) 種族背景和語言政策

中國翻譯活動最早的記載始於周代，自此之後每朝都有一些記載，但

各朝翻譯的性質和工作量差別極大，而決定因素是各朝君主的種族背景。

中國人口以漢族為主，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有不少時期由非漢族人統治（見圖1*號）。資料顯示，外族統治的歷史時期中，翻譯工作的性質與流量都與漢族統治時明顯不同，原因很簡單：漢人的王朝只在外交方面才需要翻譯，而非漢人的王朝則在政府各階層的運作都要推行雙語或多語政策^⑬，因此不但從事翻譯的人數大增，譯者的前途亦比較好，既可以在翻譯的編制內升遷，亦可以晉身行政架構。雖然中國各朝的官方譯者都處身低位，大多數不入九流，但在非漢人統治的朝代，卻有特別的招聘考試讓譯者直接加入行政隊伍^⑭。因此只有在非漢人統治的朝代才有翻譯出身的人拜高官、名留青史的例子。

另一個只見於非漢人統治的朝代的現象，是為了管治目標，把重點文化典籍由漢語譯為統治者的語言。所有漢族朝代都有極強的文化優越感，因此把外語文本翻譯成漢語從來不是漢人政府的中心關注^⑮。至於由外族入主的朝代，則一貫感覺到需要加強社會與行政組織，因此在該民族早期發展時往往借助於輸入漢文化。漢族人也許是被征服了，但通過翻譯漢文中心典籍，統治者也承認了漢文化的優越功能。經常被選入翻譯之列的典籍包括「五經」和《資治通鑑》，前者成為非漢人政府用其母語推行科舉的基礎，後者當然是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的一面鏡子。雖然上述這類典籍文化性極高，但我認為這些文本的譯者不宜歸類為第三節（甲）提到的「文化譯者」，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定位、目標讀者和翻譯目的都有不同。把中國典籍翻譯為外族語言的，都是政府行政官員，其目的是加強政府的運作能力，他們的讀者人數有限而且界線分明，

而他們的報酬也同樣顯而易見——得到君王的賞識，加官晉爵。

如果上述論點言之成理，我們就要承認，文本種類可能不是分析翻譯工作的最佳指標。我們也許應該把「政府翻譯活動」看作一個總類別，包括一般行政、外交文件與及某些高層文化的文本。至於「政府譯者」，也不限於事務性譯者，同時也包括曾翻譯個別文化性文本的人。這會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政府翻譯活動的理解。

歷史上中國固然有過在文化與政治上稱霸的時期（例如由漢族人成立的漢代與唐代）^⑯，但也曾長期讓外族統治，因應現實需要而推行異於漢族規範的語言政策。通過觀察今日的世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非漢人統治時期。資料顯示，外族統治的歷史時期中，翻譯工作的性質與流量都與漢族統治時明顯不同，這是因為漢人的王朝只在外交方面才需要翻譯，而非漢人的王朝則在政府各階層的運作都要推行雙語或多語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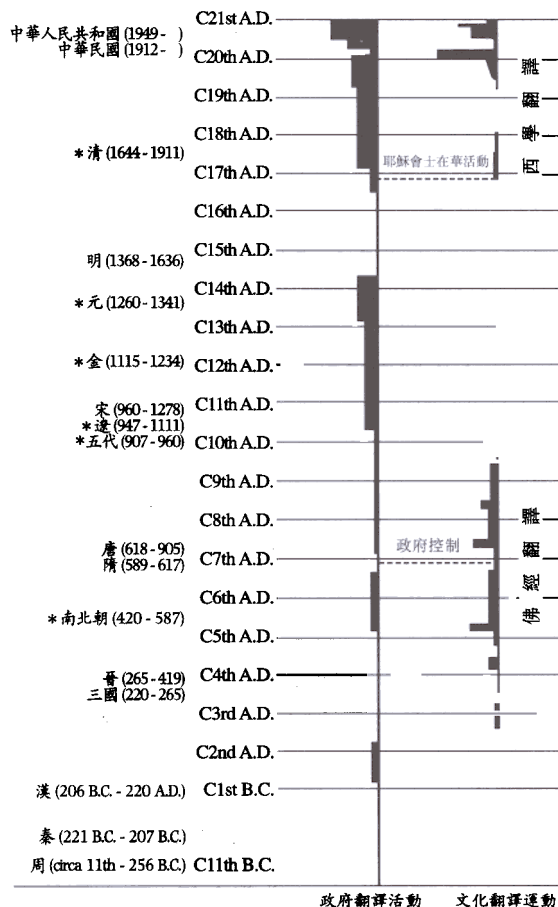


圖1 說明：此乃示意圖，不是正式比例圖。政府翻譯活動主要依據二十五史有關翻譯的記錄；民國以後的活動量是對海峽兩岸的綜合估計。文化翻譯運動顯示的是翻譯量加上譯作產生的影響。

界，從事研究翻譯的人可以清楚看到，一旦推行多文化及雙語或多語政策，不但會改變翻譯行業本身，亦同時影響別人如何理解和觀照翻譯活動。另一方面，殖民經驗也告訴我們，語言能力往往被視為對政權效忠的指標。中國歷史上政府翻譯活動提供的資料，可能證實我們已有的想法，也可能挑戰現有的想法；不管如何，結果都是加深我們在這方面的認識。

(丙) 大型翻譯運動

現有的翻譯史一般把中國文化翻譯活動分為四或五個高峰期(或稱「大潮」)，分界線或是文本種類，或是參與人的背景。這些高峰期分別是：佛經翻譯(公元二世紀中至十一世紀初)，耶穌會士翻譯(公元十六世末至十八世紀初)，西學翻譯(公元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小說翻譯(二十世紀之交)與及社會科學翻譯(1980年代)。

我們也許可以用更開闊的歷史觀來看翻譯活動，以參與翻譯運動的人希望達到甚麼目標來釐訂分界線。這會讓我們得到一個全新角度，顯示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過兩個大型翻譯運動，而這兩個運動進行時，中國人都視文化輸入的源流為一個單一的外來文化。

第一個翻譯運動是佛經翻譯，關注的是性靈的知識，參與此運動的人希望啟發主體文化內所有人，把他們帶入佛家最高境界。因為這個運動涉及的文本(源於印度次大陸的佛教著作)和參與者(佛教僧人和一些在家的信眾)性質都很單純，因此它作為一個獨立運動是所有翻譯史家認同的。

至於第二個翻譯運動，始於十六世紀，至今仍然持續。不論從文本或

參與者的背景來看，這個運動都複雜得多，以至直到目前為止，大家都認為這是幾個不同的、為時短暫的個體，而不是在同一個運動中有幾個衝刺期。與佛經翻譯不一樣，第二個翻譯大潮關注的是物質文化，而文化的來源是「西方」^⑦。這個運動由耶穌會士奠基，他們翻譯的文本包括物質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前者是他們作為中國政府欽天監官員的工作，後者則是作為傳教士所做的工作。但這個運動的最主要衝刺期是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屢戰屢敗，終於被迫承認自己不如西方列強之處，為了求生存自保，對西學產生興趣，目的是「以子之盾、抗子之矛」，因此這個時期的焦點是軍力與國力。雖然當時前衛的知識份子對西方政治、社會機制發生興趣，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是民族改革自強；至於小說翻譯成為二十世紀之交改革話語的焦點，同樣出於這個背景。雖然這個翻譯運動在不同時期由不同的文本類別領風騷，但其中心關注始終是國力。

這個運動最近的衝刺期是1980年代的社會科學翻譯。社會科學怎樣和整個西學翻譯運動結連起來，可以從1980年代其中一個翻譯策動人所說的話看得清楚：他指出1980年代的活動實際上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持續，其間只不過是讓國家某些政策打斷了^⑧。翻譯策動人自覺地說明思想傳承，正好劃出過去百餘年翻譯活動的脈絡。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的翻譯策動人比譯者起了更大的文化影響力，而這些翻譯策動人不一定懂譯本原語。語言能力正好是我們在第三節(甲)就文化譯者與事務譯者基本分別提出的其中一項，因此這一點也把1980年代的活動與自十六世紀以來的西學翻譯串連起來。

既然中國第二次翻譯運動目前仍

如果以參與翻譯運動的人希望達到甚麼目標來釐訂分界線，會看到中國至今只有過兩個大型翻譯運動。第一個是佛經翻譯，關注的是性靈的知識。第二個翻譯運動始於十六世紀，至今仍然持續。它所關注的是物質文化，而文化的來源是「西方」。

然持續進行，我們很難預測它未來的走向。但過去120年的經歷顯示了一個現象：前衛知識份子通常都會爭取超越物質文明的界線，而政府對此則非常有保留；這正好是一個典型現象，說明政府翻譯傳統與文化譯者的目標存在重大分歧。同時這也向我們展示，如果要了解任何翻譯運動對主體文化造成的影響，我們需要把眼光放得多麼遠。

四 結 語

假如第三節的敘述讓大家得到一個印象，以為連貫傳統翻譯活動的脈絡是三條直線，這只是一個假象，源於論文不得不以直線方式敘述本來是互相交織的概念。雖然我深信從這些新角度來分析歷史資料，會展示出中國翻譯傳統的宏觀圖畫，但我們現在仍無法預測這幅圖畫的全貌。不過，有兩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圖畫展示出的各種模式都不會是規則和對稱的，而其中的零星事件和灰色地帶，亦遠超過上述簡單分類可以包容的。更重要的是圖畫中會有空白地區。

存世歷史資料從來就不會為我們原原本本地提供整個故事，一個好例子就是我們缺乏有關商業翻譯活動的記載。中國有很長的國際貿易歷史（早期史料中往往稱之為外域朝貢），但對貿易翻譯活動卻幾乎全不提及^①。這一點正好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種史學規劃可以向我們展示圖畫的全貌。但我們可以期待新的脈絡讓我們看到中國翻譯經驗未為人注意的層面——包括歷史及當代翻譯活動。本文提出的個別體系，也可以作為當今中國翻譯工作者及研究者自我分析的工具：例如翻譯文化性文本的人可以先觀照自己與政府的關係，重新審視自己的翻

譯策略與選擇。就這個角度而言，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對他半生英譯中國文學作出的自我評價，實在語重心長^②：

不幸的是，我倆實際上只是受僱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甚麼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我們翻譯的很多這類作品並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

雖然楊憲益夫婦譯的是高等文化的文本，但他仍自視為政府譯人，由此可見他對於約制政府翻譯工作的種種條件，實有深入理解和體會。

楊憲益作為局內人的看法，和我對政府翻譯工作特色的描述，都讓我們無法逃避一項挑戰：重新分析中國翻譯研究目前的運作模式。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由政府直接控制，在這個教育系統中，不論是訓練譯者或是研究翻譯，種種條件都與約束政府翻譯活動的規範非常相似。與此同時，出版渠道受到嚴密控制，亦約制了文化翻譯活動挑戰現行架構的機會。這樣的制度和架構對翻譯研究肯定有影響，其影響範圍包括學者的心態、學科的文化定位與發展路向。翻譯研究在中國到底是否能走上比較客觀的學術道路，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個翻譯運動最近的衝刺期則是1980年代的社會科學翻譯，它實際上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持續。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的翻譯策動人比譯者起了更大的文化影響力，而這些翻譯策動人不一定懂譯本原語。這點也把1980年代的活動與自十六世紀以來的西學翻譯串連起來。

註釋

①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1997).

②③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 xii; xii.

③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4), 26-27.

④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運動」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1998增訂版）；陳玉剛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臧仲倫：《中國翻譯史話》（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黎雞秋：《中國科學文獻翻譯史稿》（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熱扎克·賈提尼牙孜編：《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孫致禮：《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北京：譯林出版社，1996）；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馬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一卷（漢口：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⑤ 穆雷：〈重視譯史研究，推動譯學發展〉，《中國翻譯》，2000年第1期，頁44-48。此文對註④中十種著作逐一介紹，但只作好評。

⑥ 有關小說翻譯及同期的文學翻譯活動，見David E. Pollard, ed., *Translation &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6*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8)。

⑦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 Inc., 1973), 43-44, 59.

⑧ 這並不一定是因為作者害怕出版審查的鐵剪，又或是怕惹來政治後果。也許有不少人真的相信讓學術活動為當權的政府服務是真正愛國的表現。

⑨ 迪羅達·吐斯甫汗：〈中國西域的語言文化與翻譯的關係〉，《中國翻譯》，2000年第3期，頁44。

⑩ 就中國大陸而言，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大的障礙是「說教主義」不但建基於當代政治與意識形態，亦紮

根於中國的教育傳統。這個情況讓自覺能力很難培養起來，也未必有機會發揮。

⑪ 有關單語譯者與合作式翻譯，見Eva Hung, "The Role of the Foreign Translator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arget* 11, no. 2 (1999): 223-43；孔慧怡：〈中國翻譯傳統的幾個特徵〉，載孔慧怡著，楊承淑編：《亞洲翻譯傳統與現代動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5-37。

⑫ 有關非漢人統治的朝代的官方翻譯活動，包括招聘與訓練譯者，見Eva Hung, "Government Translators in Dynastic China", *De Gruyter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erlin: De Gruyter, 2002)。

⑬ 政府譯官的低薪低職情況，只是到了清代最後幾十年才有改變，原因是與西方列強的周旋加強了懂外語的譯者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的薪金與編制都達到與中級行政官員相等。見註⑩Hung。

⑭ 中國佛教史記載有大量佛經翻譯是由政府支持的，但這其實是各朝政府控制佛教的一種手段。雖然自南北朝至隋代有個別君主的確是佛教忠實信徒，但他們只佔極少數。

⑮ 隋、唐二代王室稍帶外族血統，但這裏只以他們本人的文化定位看。

⑯ 「西方」被視為一個文化單位，正好與歐美世界流行「東方」或「亞洲」概念相映成趣。

⑰ F. C. Chen and Guantao Jin,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9-30, 159.

⑱ 在現存十九世紀資料中提到商業譯者的時候，大多帶有貶意，對他們的人品和才能都不予好評，如馮桂芬：〈探西學議〉，載《校邠廬抗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⑲ 楊憲益：《漏船載舟憶當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190。